

# 我国古代海外交通和贸易对于 广州城市发展的影响

徐俊鸣

(地理学系)

广州(它的前身番禺),二千多年来一直是华南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海上交通和贸易对它的影响特别巨大。为叙述方便,分作以下五个时期:

## 一、秦汉三国时期(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三世纪)

广州的对外贸易起源甚早,据《淮南子》的记载,秦始皇经略南越,番禺已是犀角、象齿等物的集散中心。到了汉代,番禺也是这些特产的集散地。《史记》货殖传所举全国十几个商业都会中说:“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珊瑚、果、布之凑。”《汉书》地理志也有同样记载。并特别指出“处近海”,这说明上述集散于番禺的商品大都是从海上运输来的。

西汉社会发展到了汉武帝时期达到了高峰。在西北打开了陆上的通商大道——“丝绸之路”,在南方发展了海外交通和贸易。由于当时船舶尚小,需要沿海岸航行,所以我国在南海的出航地点不在番禺而在徐闻、合浦、日南等地。然其进口货物似仍集散于番禺,此可以从《史记》所举的南海沿岸的都会,仅有番禺而未提及徐闻、合浦等地可为佐证。

东汉末期,南海一带已为吴所有,建安二十二年(216),吴将步骘将交州由广信(今梧州)迁至番禺。黄武五年(226)孙权将交州东半分置广州,以番禺为广州治,这是广州得名之始。在吴人的积极经营下,广州的对外交通和贸易,比之汉代有进一步的发展。

关于这个时期番禺城市的情况,文献资料不多,仅知秦代的番禺城(俗称任嚣城)范围很小,在今登峰南路西侧,宋时为盐仓(见《南海百咏》)。赵佗割据时扩修的越城(俗称赵佗城),则范围大增,周长十里。据《方輿纪要》说:“汉筑番禺城于郡南(应为东南)六十里,为南海郡治,今龙湾、古霸之间是也。”按龙湾、古霸在今番禺县沙湾附近。但访问该地父老,已无知有古城。而广州市郊则发现不少汉代墓葬,是则汉代的番禺是否他迁,尚待进一步研究。东汉末,吴将步骘把交州

由广信迁治番禺时，曾重修赵佗故治，其范围仅有赵佗城的西半，关于这些城址的拟定，笔者在《历史时期广州市区的水陆变迁初探》一文中已有论述（载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8年第一期）。

## 二、两晋及南北朝时期（三世纪后期至六世纪末）

西晋虽然结束了三国分立的局面，然晋武帝死后不久，即有“八王之乱”，引起原居长城内外的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入侵，形成五胡十六国大混战的局面，中原残破，晋室南迁，偏安江左。统一的时期不过半个世纪，而偏安的局面反而维持了约一百年。接着为南北朝，在一个半世纪中，南方连续更换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

在这一时期内，南方由于距离中原较远，局势还比较安定。在此长达数百年的战乱中，有大量的汉族南迁，促进了广州腹地的开发。同时，由于我国西北对外交通的陆道比较不便，也使南海对外交通日益发展。

西晋泰康二年（281）大秦使者曾经过广州赠送火浣布（石棉布）等物。在这一时期中外僧人往来于南海的很多。西晋时有耆域，张星娘氏认为他是从海道来中国的第一个古印度僧人（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但他在广州没有留下什么遗迹。东晋隆安中（397—401年），有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僧人昙摩耶舍到广州创王园寺（即今光孝寺）。我国僧人法显于隆安三年（399年）由长安循陆道前往天竺求经，在外十余年，后由海道返国。从他所撰的《佛国记》中可以看到那时广州和南海各国之间的交通和贸易已相当频繁，航程可估计日数。这是由于船舶较大，又能利用季风，不一定要沿岸航行，所以航期比汉代快了数倍。按汉代由徐闻、合浦到都元国（在苏门答腊岛或马来半岛上）航行要150天（五月），而晋代则仅需50天了。

在南北朝期间，由海道来到广州的中外僧人更多，见于《高僧传》等书记载者有七、八人。

在这期间，广州的海上贸易也很兴旺，地方官吏往往插手商业，经营翡翠、明珠、犀角、象牙等买卖，每致巨富。《隋书》食货志曾概括地说：“晋元帝居江左，岭外酋帅，因生口（奴隶）、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州曲，朝廷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

在两晋和南北朝期间，广州没有关于修城的记载。而广州的佛寺如仁王寺、光孝寺、六榕寺、华林寺的兴建则皆在此时。这些佛寺都在当时广州城的西郊，谅因其附近的陆地不像现在辽阔，这些寺庙还接近深水湾头，外人容易到达之故。

中国史书，在东吴以前，凡通西南海上西蕃史事，常说某国在徐闻、合浦、日南以南若干里，但自两晋南北朝起，则常称去广州若干里，由此可知，晋代以前，

徐闻、合浦、日南为南海市舶冲要，晋以后，则以广州为通往海外诸蕃的主港了。

广东在梁时，用金银为货币。国内其他地方则用铜钱和谷帛。至梁末，改铸铁钱，钱制大坏。陈时，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或金银交易，俱不用钱，由此可见广州一带由于海上交通和贸易，使地方经济比较富裕，而金银等货币的使用又更有利海上贸易的发展。

### 三、隋唐五代时期(六世纪后期至十世纪中叶)

隋开皇九年(589)平陈，结束了自东晋以来将近三百年南北分裂的局面，我国重新进入大统一。隋代又开凿了南北大运河，国内经济有所发展，对于海上经营也很积极。大业三年(607)隋炀帝派人出使赤土国(在马来半岛上)，是从广州出航的。

唐代封建经济高度发展，对外交通发达，为东亚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当时在亚洲西部兴起了一个强大的阿拉伯封建帝国——大食国，它的海上商业也很发达，遂使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风帆如织，贸易更加兴旺起来。

德宗贞元间(785—804年)宰相贾耽在他所著《皇华四达记》中，列举唐代通达外国的主要交通路线七条，其中陆道五条，海道二条。海道中的“通海夷道”是从广州出发的。该书已佚，而《新唐书》地理志中曾有记载，由广州可直至西亚和非洲东岸等地。

据阿拉伯人苏来曼《东游记》等说：唐时，中国海船特别巨大，能抵御波斯湾的险恶风浪，称雄海上，对外通商繁盛。中国输出的主要商品，有丝织物和瓷器。埃及福斯他特遗址，叙利亚沙玛拉遗址，印度勃拉名纳巴特遗址均发现大批唐瓷片。可以设想，瓷器在唐朝已有大宗出口。沙捞越发现唐人开设的铸铁厂，据考证，该地的铸铁技术自中国传入。唐代高度发展的手工业产品和技术，通过商人曾对海外诸国作出贡献。

唐代曾在广州设置市舶使(又称“结好使”)，管理对外贸易。

隋唐两代关于论述广州城区情况的资料不多。自三国时吴步骞修城后迄未见有修城的记载。在唐亡前一年(天祐三年，906)，清海军节度刘隐始将广州城向南扩展，称为兴王府。而宋代的子城就是以南汉城为基础修建起来的。结合文献和地形看来，唐代的广州城，可能东起登峰南路以西，西抵教育路以东，北起越华路，南抵青年文化宫附近，是一个周围不及五里的小城。

据阮元《广东通志》载：“布政使司署在双门大街，隋为广州刺史署，唐为岭南道署，号曰都府。”由此可见隋唐的广州最重要的衙门都在正对清海楼(南门)的双门大街，亦即今之北京路。这是当时城市的中轴线，而繁荣的商业区则在城外，外商留居的蕃坊也在城西今光塔街一带。

关于广州之有蕃坊，据现在所知，以唐代房千里的《投荒杂录》(或作《投荒

录》)的记载为较早。该书已佚,转见于清初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

蕃坊所居多为阿拉伯和波斯人,他们皆信仰伊斯兰教,所以在蕃坊修建有伊斯兰教寺—怀圣寺。寺中有塔,俗称光塔或蕃塔,寺前的街即称为蕃塔街(见阮元《广东通志》)。

记载光塔最早的是南宋方信孺《南海百咏》一书。它说:“蕃塔始于唐时,曰怀圣寺”以后其他记载亦多认为是唐代所建。

唐代广州有很多外国商人留居,据一外国资料记述,唐末黄巢破广州后,阿拉伯商人及船主,结队回国。当时外商多经营珠宝,每致巨富,常与中国地方官吏勾结,剥削我国劳动人民,起义军对他们进行镇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证以宋代仍有很多阿拉伯商人留居在广州,则他们的离去只是暂时的。

蕃坊是蕃商自建房舍以备久居之地。而唐代政府有无设置驿馆或市舶亭之类以接待外宾,文献未有明确的记载,仅《全唐文》卷五一五有王虔休进岭南王店使院图表一文提到曾修“海阳旧馆”一事。按王虔休是在德宗贞元间(785—805年)任职广州的。《隋唐史》的著者岑仲勉指出:《蒲寿庚考》的译者陈裕菁认为海阳旧馆是指在潮州附郭的海阳县是错误的。海阳乃海北之意,前临的广江是指珠江,唐代的海阳馆的位置可能就在宋代的海山楼和市舶亭位置,宋盖承唐制而建设也云云。岑氏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但当时馆名是否叫做“海阳馆”,则尚待进一步研究。

隋唐时,广州在今黄埔一带已有外港,据《羊城古钞》南海神庙条说:“在城东南扶胥之口,黄木之湾,庙中有波罗树,又临波罗江,故世称波罗庙。祀南海神。……随开皇中(589—600年)创建。”波罗庙今犹存,位于黄埔港(指旧港)以东不远,其附近村名庙头,即宋之扶胥镇,唐之古斗村,谅亦在其附近。

据《高僧传》和《续高僧传》所载,唐代往来南海的中外高僧不下四十人。他们出航的地点以广州为最多。

在唐亡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907—960年),我国中原地区,先后更换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短命的王朝,在边缘地区则分建了十个割据小国,史称为五代十国。当时两广一带始终为十国之一的南汉所统治。

五代时期南方各国,战争较少,政局比较安定,加之有北方汉族南移,原为唐岭南东道清海军节度使的刘隐招集这些流落岭南的汉族士人作为辅佐,逐渐巩固了他割据的政权。关于南汉对外交通和贸易的情况虽然正面的资料不多,但从刘隐贿赂后梁的礼物和刘岩(即刘龔,龔音俨)和刘𦏧等大造宫殿所使用的物件中,不难看出都是舶来品。详《旧五代史》梁太祖纪。

南汉国君,自刘岩起至刘𦏧都是穷奢极侈的统治者,在广州城内外大建离宫别苑,其遗址尚可考者如南宫在今西湖路一带,芳华园在今流花桥一带,昌华苑(即显德园)则在荔枝湾一带。

#### 四、宋元时期(十世纪中叶到十四世纪中叶)

宋王朝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建立了统一的国家,虽然其国势不及唐朝强大,但手工业和商业比唐朝有更大的发展,海上交通和贸易也比以前更加发达。

宋对于海外贸易非常重视,外贸收入为国家重要税源之一。太祖开宝四年(971)平定南汉后,立即在广州设立市舶司管理通商和保护广州的外国商人。接着,在杭州、明州(今宁波)、泉州等地也设立了市舶司。

由于宋代我国经济重心已经南移,所以上述港口虽多,而以南方的广、泉、明三司为最要。

据成书于南宋淳熙五年(1178)周去非所著的《岭外代答》,和成书于南宋宝庆元年(1225)赵汝适(音括)的《诸蕃志》等书记载,宋代和我国在贸易上或政治上有联系的有五十余国,其中许多国家的名字都不见于前代记载,足证这些国家大都是在宋代才开始与中国往来的。

至于宋代我国的出口货,《宋会要》中但说:以金、银、緡钱、铅、锡、杂色帛、精粗瓷器、易香、药、犀、象。关于广州陶瓷出口,据《萍洲可谈》:“船深阔各数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货多陶[瓷]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处。”当时我国的铜钱有不少外流,所以至南宋初,绍兴十一年(1141)有“不得夹带铜钱出中国界”的禁令(见《宋会要》)。十九世纪以来,在印度、东非桑给巴尔、索马里等地均有宋代铜钱出土(转见《蒲寿庚考》32页)。

指南针应用于航海首见于北宋朱彧的《萍洲可谈》(成书于1191):“舟师…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是则我国在十一、二世纪之交已知使用罗盘针于航海,比之阿拉伯人要早一个世纪左右。

乳香是我国在宋代最主要的进口货,据《粤海关志》转引略称: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由广州进口的乳香,约占全国进口的乳香98%,故乳香被称为“广东香”、或“岭南香”。而由广州进口的外国药材如没药、阿魏、芦荟、无名异、葫芦巴等,则称为“海药”或“广药”云。

在两宋三百余年间,我国各埠的情况也有变化,广州设市舶司最早,又继承唐代的基础,对外贸易最盛。迨后,大概由于泉州比较接近南宋行都杭州,且船舶使用指南针以后,由台湾海峡直驶南海,比之从广州放洋更为顺风顺水,所以到宋末元初,在台湾海峡西侧的泉州就凌驾广州之上成为我国当时最重要的港口。

蒙古贵族建立了横跨欧亚的联盟大国,我国西北陆路畅通。然元人也很重视海外贸易,利用宋代曾任泉州提举市舶官三十年的阿拉伯人蒲寿庚的降附,继续主持对外贸易,所以元代海上的交通和贸易其繁盛不亚于宋代。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在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和澈

浦（今浙江海盐县澉浦）四处置市舶司。当时广州尚在宋元争夺中（崖山之役是在至元十六年，1279），故迟至至元二十三年（1286）广州始设市舶司。此后又增加温州、杭州等港。后来港口屡有变动，至英宗至治二年（1322），仅有泉州、庆元、广州三处，其中以泉州为最盛，次为广州。明州则多对朝鲜、日本等国贸易，其范围较为狭小。

据在天历二年到至正四年（1329—1345）曾附海舶远游各国的中国旅行家汪大渊，在他所著的《岛夷志略》（成书于1350年）中所举的国家比宋人的记述为多，而在元代陈大震所撰的《南海志》（近年复制的残卷）所记载的海外各国，其数目又比《岛夷志略》所载者尤多。

唐代广州虽然是世界著名的大商港，但广州的城垣并不大。商业区多在城外。两宋三百多年间（960—1279），广州城垣曾扩建或修葺了十余次之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北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在南汉兴王府城基础上加筑子城（又称中城），周长五里；北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在古越城的东部筑东城，周四里，与子城合而为一。翌年（1071）又增筑西城，规模最大，周长十三里余，主要是保护“蕃汉大贾巨室”，“蕃坊”也在其中。

宋代外商侨居广州的似较唐代尤盛，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如《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4说：“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多流离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禁网疏阔，夷人随商翱翔城市。”宋代蕃坊仍如唐代在今光塔附近。但许多史书均说蕃商常与中国人杂居城中，是则蕃商亦未必尽居一处。

蕃坊系侨商自营的房舍，另有由政府设置用以招待外宾的馆舍称为驿馆，二者不宜相混。宋人楼钥《攻媿集》卷86汪公行状称：“宋时泉州有来远驿，广州有怀远驿，为招待贡使之所，不可视同蕃坊也。”但据《輿地纪胜》卷89则把广州的驿馆亦称为来远驿。

据元人陈大震《南海志》卷10指出，元代广州的驿馆有二处：一为来远馆，设于蕃巷；另一为来归馆设于冲霄门外。“冲霄门在子城之东南隅，州学之直。”（见卷8）按州学即清代的广府学宫，今为第一工人文化宫，其南，清代有文明门，元代的冲霄门，当即清代的文明门。而“直”是直对的意思。

宋代广州除驿馆之外，政府又建有市舶亭和海山楼为管理海舶和宴请舶商的地点。据北宋朱彖著《萍州可谈》称：“广州市舶亭枕水，有海山楼，正对五洲，其下谓之小海”。同书又指出海舶来了，“泊于市舶亭下，五洲巡检司差兵监视，谓之编栏”。海舶初来，有阅货之宴，临行又有慰劳送别之宴，称为“犒设”或曰“设蕃”。这个宴请蕃商的地方就在海山楼。海山楼又是检阅水军的地方，据《南海百咏》称：“海山楼建于〔北宋〕嘉祐中（1056—1063年），今在市舶亭前。……宋时，经略安抚于五月五日检阅水军教习于其上。”

宋代的市舶亭和海山楼的位置，有在城南和城西南二说。城南已有东横街和高

第街（今群众街），而临江的市舶亭和海山楼约在今北京南路与东横或群众街相交处或稍南，即在今天字码头以北的地方。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广州日报》刊载的《广州对外贸易史话》中说，唐代广州珠江河畔有“山海楼”，这是不对的，不但朝代弄错了，而楼名也被颠倒了。

宋代广州城南的珠江水面辽阔，号称“小海”，风浪较大，为了便利中外商船的停泊，在北宋开国（960）后半个百分点左右，即开始筑内濠。

城南内濠的西段，因南临西澳（今海珠中路南濠街一带），北接蕃坊（今光塔一带）最为热闹，在闹市中建有高五丈多的大楼，名为共乐楼，气势雄伟，为南州冠。熙宁四年（1071）主持修建西城的经略使程师孟的咏共乐楼诗说：“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转见《舆地纪胜》卷89）。这首诗不但概括而形象地描画了宋代的广州，特别是西城区繁荣的景象，而且指出它的繁荣同梯山航海而来的中外商人有密切的关系，据《羊城古钞》、《南海县志》等书指出：共乐楼在南宋绍兴中曾加重建，元代大德六年（1302）又新修了一次，改名远华楼，以后又曾称为越楼或粤楼，至元末始毁，未再重建。可能自元代以后，由于西澳逐渐淤塞，繁荣中心又逐渐移到稍南的濠畔街了。

宋代广州的蕃坊仍如唐代，在今光塔附近，这从南宋岳珂在他所撰的《程史》中所描述的蒲姓宅后的窄堵坡，其形状和光塔完全相同，可为明证。在唐代，蕃坊本在城外，宋代增筑西城，始包括在西城之中，但同官衙所在的中城并不在一处。日人桑原氏根据宋代有“化外人法不当城居”的规定，认为蕃坊亦和宋代的市舶亭、海山楼一起，“在广州府城之南”因而指责日人藤田氏主张广州蕃坊在城内为“似不可信”（见《蒲寿庚考》55页）。事实恰巧相反，搞错的不是藤田氏，而是桑原氏自己。这是由于他不了解宋代广州三城范围所引起的误解。

宋代广州的外港有扶胥镇。它就是唐代的黄木湾亦即今之波罗庙前的水面。庙头村旧为扶胥约。庙前小丘上有浴日亭，“扶胥浴日”宋代列为羊城（即广州）八景之一，亦称“波罗浴日”。南宋初，杨万里有诗说：“大海更在小海东，西庙不如东庙雄，南来若不到东庙，西京未睹建章宫。”（见《杨诚斋集》）。按宋代在广州城下的珠江，称为小海，而在今黄浦一带称为大海。东庙指波罗庙，西庙指在西关第十甫（今秀丽二路西端）另一南海神庙（今已无存）。杨氏把波罗庙比作汉代西京城外著名的建章宫，自然是诗人夸张的说法，但亦不难想象当时扶胥镇繁荣的景况了。

元代，广州仍如宋代的三城，没有扩筑，这大概由于当时中国外贸的重心已转移至福建泉州之故。

## 五、明初至清中叶(十四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中期)

明代的封建经济比元代有进一步的发展，但它长期间内实行“海禁”政策。其

初是防范原来割据江浙一带的张士诚、方国珍的余部逃入海岛勾结“倭寇”，骚扰沿海，所以实行由政府控制一定范围的海外贸易。

明太祖时，曾规定金、银、铜、铁、缎匹、兵器等不能出口，洪武二十七年(1394)又“禁民间用蕃香、蕃货。其两广所产香木，听土人自用，亦不许越岭货卖。盖虑其杂蕃香，故并及之。”（见《洪武实录》卷231）。

洪武初，曾一度设市舶司，其后，屡设屡废。

永乐年间，由于政权日益巩固和经济的继续发展，明廷对于海外贸易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据《明史》食货志市舶条称：“永乐三年（1405），以诸蕃朝贡益多，乃置驿于福建、浙江、广东三市舶司以馆之。福建曰来远〔驿〕；浙江曰安远〔驿〕；广东曰怀远〔驿〕。”从此，宁波、泉州和广州同时又复设市舶司并附设招待外宾的驿馆。

自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二十余年间，明廷曾派遣郑和和王景弘等率领巨大的舰队先后七下“西洋”（指印度洋及南海），我国巨大的“宝船”曾远达西亚和东非等地。

据《明会典》载，明朝对于海外各国来华贸易（名为朝贡）经由广州领取“勘合”（准许证）亦即由广州登陆入京的有十五国，即暹罗（今泰国）、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利加（今地待考）、苏禄国东王、西王，苏禄国峒山（苏禄今属菲律宾），渤泥（今加里曼丹岛北部英属文莱国），古里（今印度西岸科泽科德一带），古麻喇（今地待考），爪哇（今印尼爪哇岛）、真腊（今柬埔寨）、柯支（今印度西南岸柯钦一带）、锡兰山（今斯里兰卡）；苏门腊刺（今印尼苏门答腊）；榜格兰（今孟加拉国和印度西孟加拉邦一带）。至于民间的或间接与广州贸易的国家，当不止此数。

据《明会典》说：“市舶提举司，后福建、浙江俱革，今（万历年间）止存广东司。”

在明朝后期，我国的对外贸易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是由于欧洲的早期殖民主义者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吉利等先后东来，他们海盗式的舰队打破了明王朝的所谓“朝贡”式的贸易。

明代的广州城曾扩展了两次：一次在洪武十年（1377），除把宋元的三城合而为一外，并向北扩到越秀山上，其目的是更有利于防守。另一次的扩展是在嘉靖四十四至四十五年（1565—1566），在柘林兵变骚扰省垣之后，鉴于城南新发展的商业区缺乏保障之故。

康熙二十五年（1684），清政府乃于江苏的云台山（今镇江附近）、浙江的宁波、福建的漳州和广东的广州分设四个海关，仍如明制，对外施行有限制性的朝贡贸易。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封闭了江、浙、闽三关，独留粤海关（广州）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历时八十多年。直至鸦片战争开放五口通商以后，情况才开始改变。

由于世界社会经济发展和对华贸易对象的变化,遂使对外贸易的商品也起了变化。从清代起,我国的出口品,茶叶已压倒丝绸、陶瓷,跃居出口品的首位,而外商常以银元来购买我国的商品。贪婪狡诈的英商竟首先以鸦片转运来华毒害我国人民,以弥补其贸易的逆差。法、美等国也都采取同样卑劣的行为。从此,大量的白银反由我国流出,对我国的经济破坏极大。

清人魏源所编的《海国图志》卷一中指出:“中国以茶叶、湖丝馭外夷,而外夷以鸦片耗中国,此皆自古所未有。而本朝(清朝)之有茶叶行于西洋,自康熙始,而鸦片入中国亦自康熙始”。但另据莊晚芳著《中国的茶叶》一书则认为在明万历三十年(1602),荷兰人已将我国的茶叶介绍到欧洲,英人则在清顺治四年(1657)开始购买中国的茶叶,至雍正三年(1725)达三十余万磅,到乾隆五十四年(1789),已成为中国茶叶最大的顾客云云。庄氏的说法似较为详确。但这里所说仅就我国的茶叶输出欧洲而言,至于输出东南亚则为时较早。

在这一时期的外贸对广州市区的影响较显著的是招待外宾的驿馆由西湖路迁至城西的西关,而市区繁荣的中心则由城南的濠畔街亦逐渐转移到西关。

自宋置来远(或怀远)驿于古西湖的奉真观旧址(见《舆地纪胜》),沿用至明初。清郝玉麟《广东通志》称:“永乐四年(1406)置怀远驿于广州蚬子步,建屋一百二十间以居蕃人,隶市舶提举司。”按蚬子步即西关十八甫路。现今十八甫路东段(旧亦称十七甫)以北尚有怀远驿街,即其旧址。

关于清代十三行所设的“夷馆”大致在十八甫以南即明代的怀远驿之南,因为其时陆地已向南扩展,江岸亦已南移,今十八甫之南尚有一条东西向的十三行路,这不过是十三行夷馆的一部分,该路的南北两侧,特别是南侧有广大的地方都是洋商码头以在。有许多南北向的街道可通当时的江边(今文化公园一带)。

明初,城西南濠畔街一带最为繁华,但到清初,该地已趋衰落。

濠畔街一带的繁荣乃继承宋代西澳繁荣区的南移的结果,而西澳的繁荣则因其接近波斯、阿拉伯商人集居的“蕃坊”之故。明初,广州的怀远驿早已移于西关十八甫,而更重要的是自明中叶以后,和我国进行贸易的主要国家,已不再是西亚的波斯和阿拉伯人,而是欧洲的早期殖民主义者。自清设十三行以后,这一带就成为当时广州最繁华的地区了。

明清两代广州的外港为黄埔,据《海国图志》:“黄埔在水中央,周围皆洋货船,而内地尤帆樯如林。”樊封撰《南海百咏续编》亦谓:“黄木湾在郡东波罗江口,即韩昌黎(愈)南海神庙碑所称:扶胥之口,黄木之湾是也。土语讹为黄埔,为省河要津,近为夷人停泊〔鸦片〕所矣。”

## 小 结

根据历史事实看来,我国古代海外交通和贸易对于广州城市的发展的影响,可

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1〉自秦汉起,广州的前身番禺是我南海滨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在海外交通和贸易方面已带有全国性的意义。它的海外交通和贸易的发展是我国人民善于利用广州接近东南亚和印度洋的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开通五岭使广州的腹地超越出珠江流域有密切的关系。经过二千多年来时间的考验,总的趋势是不断地向前发展。

〈2〉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来,广州的对外交通和贸易的发展,可约分为以下几个阶段:〈a〉秦汉至三国——此时船舶尚小,须沿岸航行,那时我国南方的出航点常在交州(如徐闻、合浦等)境内,但其商品仍多集散于番禺。〈b〉晋至南北朝——海舶渐大,可离岸航行,使航期大为缩短,已出现直航广州的记载。广州商业比前有所发展。〈c〉隋唐至宋——我国的唐王朝和西亚的大食帝国并起,印度洋上巨舶往来如织,广州成为世界著名的港口。季风和自北宋起指南针应用于航海,航线经过七洲洋(我国西沙群岛),航行可远抵东非等地。〈d〉南宋至明中叶——由南宋起,珠、宝、香、药等消费中心移至杭州以及利用台湾海峡的顺风和急流,广州成为南海航线的一侧,使自宋末元初起,泉州压倒广州,明初郑和等七下西洋,多由福州或泉州放洋。〈e〉明中叶至清中叶——欧洲早期殖民主义者的东来和当时中国政府采取闭关政策,封闭其它各埠,广州又成为我国外贸最盛的港口,直至鸦片战争,开放五口通商以后,形势始变。

〈3〉对外交通和贸易不但对广州整个城市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广州市内某一地区的特别繁荣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唐宋时广州的热闹市区在惠福西路(今向阳四路)附近,是因其北接蕃坊,南临西澳。后因西澳和西湖等的淤塞,招待外商的驿馆的西移,遂使明清两代城外西关成为广州最热闹的市区,直至解放前,广州市的金融和商业繁盛的中心仍在十三行街和上下九甫(今秀丽二路)一带。

〈4〉从广州出发的海上对外交通路线,和我国西北方经中亚至西亚的陆路(丝绸之路),对我国与西亚、北非、南欧等地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历史上西北陆路不时受阻,而南海航线则长期畅通。

〈5〉广州的河港而兼海港的优越的地理位置今后自仍有其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海轮吨位的日大,广州航道的水深已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但广州由于有悠久的历史基础,早已形成了巨大的城市,苟能多建外港以为辅助,则它的发展前途是无限美好的。

## The Effect of Overseas Traffic and Trade on Guangzhou City Development in Ancient China

*Xu Junming*

###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zhou (panyu), the "South Gate" of China, wa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overseas contact, which has recorded a history of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The city became a famous port in the world during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n Tang dynasty many foreign merchants already lived in Guangzhou. The city wall was enlarged many times in Song dynasty, during which time the "West City" was set up to protect rich merchants,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But in Yuan dynasty the city wall remained unchanged, because the centre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then had shifted to Quanzhou in Fujian province. In Ming dynasty China's feudal economy experienced a new progress. During late Ming all Chinese ports were closed for a time to foreign trade except Guangzhou, with the result that its city wall was enlarged once more. Lastly, the gradual shift of down town section from the south to the south west part of the city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shift of deepwater coastline more or less along the same direction.